

导论： 理论与分析构架

中国—东南亚学 终点作为开端^{*}

“从亚洲看亚洲”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亚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趋势；它不仅寻求建立新的理论范式（Paradigm），以摆脱西方中心的观点，而且试图探索影响亚洲历史与当代变迁的两种重要力量：来自亚洲内部自身的动力以及由全球化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这些外力所引发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亚洲研究模式，这将有助于对近现代的亚洲历史进行新的评价。

本文提出两个相关的论题与观点。第一，现存的亚洲研究在结构上存在着重大的局限：它人为地将整个亚洲区域划分为几个次区域（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并以民族国家论说（Nation-State Narrative）作为整体分析的出发点，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处（亦即民族国家的疆界）作为分析的终点，这就忽略了各个次区域之间的“灰色地带”以及它们的互动关系；第二，更重要的，通过集中分析与考察不同的次区域／地理文化圈之间的“接触区”（Contact Zone），我们能够重新检讨亚洲历史

^{*} 本文的初稿曾在印度拉贾斯坦邦 Sariska 举行的“从亚洲看亚洲：进程、转型和主题”国际工作坊（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学会主办，2000年2月19日至21日）及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五十二届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2000年3月9日至12日）上宣读。笔者在此感谢与会者的批评和建议；同时，特别感谢王康武教授、Benedict Anderson 和 William Frederick 教授的启发性意见。

变迁的动力与特征，从而对整个区域的发展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东南亚学”（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这一理论构架，将“接触区”作为分析的起点，以尝试解构并阐释亚洲次区域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对民族国家内部进程的影响。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分析了现存的亚洲研究在结构上的局限性；第二部分探讨用于建立中国—东南亚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第三部分以 20 世纪的若干重要历史个案为例，说明中国—东南亚双边互动的多重模式及其影响。结论部分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课题做一些初步的建议。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是一个复杂而包含广泛内容的课题，由于篇幅的局限，本文无法涉及中外许多重要学者及其先驱性论著（如冯承钧、O. W. Wolters、王赓武、Anthony Reid、滨下武志、Alexander Woodside、韩振华、朱杰勤等等）。因此，本文并非对所有有关的论著做全盘与系统的回顾与评论，对 20 世纪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亦较少涉及。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 20 世纪的事例，试图就亚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的内在逻辑性和理论基础进行初步的（或许是不成熟的）讨论与分析。

一、“中国—东南亚学”之必要性：

亚洲研究的结构性局限

众所周知，西方（尤其是美国）亚洲研究的结构始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融合人文、语言和社会科学的角度，亚洲研究被建构成一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整个区域也随之被划分为前面所述之四个部分：东亚、

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在西方，从大学的研究中心到专业团体（如美国亚洲学会 [AAS]）到主要基金会（如社会科学研究会 [SSRC]）都根据这一结构而划分。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止，这一分类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亚洲研究体系——基本上并未受到任何重大的挑战。然而，近年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这一结构的价值与合理性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与质疑。首先，一些美国学者指出，亚洲研究诞生于冷战的高潮之中，它从一开始就是“民族安全国家（National - Security State）的产物”。如芝加哥大学教授 Bruce Cumings 所称的，亚洲研究成为“国家／情报机关／基金会的综合物（Nexus），它建构、资助、并确定当时研究的目标与方法”^①。

其次，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西方）消费文化的日益普遍，空间与时间被压迫和缩小，作为一种文化区域的亚洲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已变得更为普世化和都市化（Cosmopolitan），而非特殊化。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必须强调全球的和比较的研究，而非专门地研究特殊的文化和区域。

第三，“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在近年来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与此同时，新的学术思潮（如文化研究、种族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等）也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它们对现存的区域研究的地理基础以及民族国家论说构成了方法论和理论上的挑战^②。

本文的目的并非详细讨论这些批评的合理性以及（西方）亚洲研究学者的反应。大体来说，许多学者都意识到现存亚洲研究的局限，并尝试以新的方法来重振亚洲研究或为之重新定位。然而，这些尝试主要着眼于应付来自亚洲（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和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之外的挑战；在对亚洲研究进行重新检讨的过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亚洲研究在现存结构上的局限性。这里我

所指的是对亚洲各次区域（Sub-region）近乎僵硬的划分法，而这一分类法被民族国家论说所强化。除了少数一些例外^③，有关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关系之研究绝大部分集中于 20 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有关 20 世纪的研究或者侧重于双边外交关系，或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华人移民东南亚的进程^④。在这些研究中，地理成为固定不变的疆界之象征，它将中国与东南亚这两个范畴绝对割裂开来。与此同时，多数论著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其关注的最主要对象是对主权、人民、市场和自然资源的争夺。

这样，这些处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交界地带”就被忽视了。这并非偶然，除了由于冷战的环境之外，次区域的划分法以及以民族国家作为主体论说的模式反映了二战结束以来在亚洲新独立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后殖民意境。正如王康武教授所指出的，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变迁（Paradigm Shift）主要是一种学术和知识现象，而在亚洲新兴国家，范式变迁则更多的是被外在环境所制约，受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影响^⑤。与此同时，50 年代以来日渐盛行的“东南亚历史自主性”思潮（主要关注于当地原住民的独创性以及当地特殊的历史进程）则进一步削弱了对外来势力的影响的重视^⑥。

尽管现存的亚洲研究结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涉及跨国与跨次区域的问题时，它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其一，现有的研究范式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在 1900 年之前中国与东南亚就已经进行了近千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商业与文化交往。这一历史已被深入研究和普遍认可^⑦。诚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东南亚地区最潜在的特质在于跨文明间的交流及其对当地的影响。在与主导的外来模式积极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东南亚传统，正是这一外来的与本地的模式的灵活融合构成了本地区最鲜明的特征，而非任何持续性的本土结

构。”^⑧虽然东南亚与中国的积极互动关系并未随着西方殖民化进程而停止，学术界对 20 世纪亚洲历史的分析受到了“西方冲击—亚洲反应”这一模式以及冷战对立的影响，使得中国在东南亚的广泛而复杂的作用被简单地归类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有关 20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的著作几乎都来自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这清楚地表明了民族国家论说的主导地位。这一论说对人口、观念的交流以及跨界的社会商业网络通常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二，由于对历史持续性的忽视，现有的亚洲研究结构无法看到在 20 世纪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之下所存在着的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因素。如同本文将要论及的，这些互动既存在于看得见的层面（如围绕南沙群岛主权的领土争端、人口与资本的跨界流动等），也表现于看不见的领域（如观念的交换与融合）。这些互动不仅影响了双边外交关系，更重要的，它们对各自的内部发展以及整个亚太区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其三，现有的“次区域划分”一民族国家论说人为地将族群性（ethnicity）同国家分裂开来，从而导致将东南亚华人问题研究孤立于地区历史的倾向。民族国家论说是与固定的地理疆界以及（土著原住民的）族群性密不可分的。根据 Anthony Smith 的看法，种族群体“具备了共同祖先的神话、历史与文化，并与特定的疆域及团结感相联系”^⑨。然而，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东南亚华人事实上与当地的疆域以及原住民的历史传说相脱节。因此，以（土著）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论说通常将华人排除于东南亚国家形成进程之外，这间接地造成“华人问题”成为一个单独的分析范畴、而非作为区域内部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同本文后面将要论及的，正是其跨越国界的流动性及其“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的心态构成了东南亚华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四，西方现有的亚洲研究结构无法将大量的中文史料以

中国观点引入东南亚研究之中。由于西方东南亚研究者通常不谙中文，且甚少跨入“东亚”领域，因而他们无法将丰富的中文资料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观点”融入对 20 世纪东南亚历史的分析之中；而国内学者如果又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界中的对话的话，那么，以西文资料和西方观点为基础的西方中心思想将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简言之，对近现代中国、东南亚及其双边关系的出发点和理论框架是民族国家和次区域的地理划分^⑩，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整体分析框架，用于解构与重新审视两个地理与文化圈之间的广泛而复杂的互动模式及其对各自内部进程的影响。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者提出了“中国—东南亚学”的概念。

二、“中国—东南亚学”的可能性 界定“接触区”

如前所述，亚洲研究的结构重组必须注重到地方、区域与全球力量之间多层面的互动关系，而中国—东南亚学则有助于达致这一目的。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东南亚学”，？

“中国—东南亚学”并非主要关于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外交关系或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它的重点也不是在东南亚华人本身，尽管以上内容构成“中国—东南亚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中国—东南亚学”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分析框架，用于系统地和科学地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互动的动力、进程与后果。它不仅注重货物、资本、信息和人口的双向交流，而且也注重这些互动关系如何产生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对国内、区域和全球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东南亚学”的核心可以说是“终点作为开端”，它的出发点是多数中国或东南

亚研究学者所认为的终点，亦即各自文明的交界处。在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和“次区域”论说看来，这一终点并没有特殊的理论或实证的意义，因而也通常受到忽视。

如果以上定义可以被接受的话，我们就必须系统地面对以下五个概念上与方法论上的论题，以使“中国—东南亚学”获得逻辑与实证上的支持。

1. 证明现象的存在。社会学家 Robert Merton 曾指出，在没有证明一种现象存在之前而尝试去解释它，这将是徒劳无功的^⑩。就 20 世纪中国—东南亚互动关系而言，我们必须探索的是，在 1900 年之前就已存在的广泛的双边交往是否停止或减少，或是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再现（因而受到民族国家论说之忽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界定两个前提分析条件：这些互动关系并非暂时的或例外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交往的内容并未被融入现有的分析框架之中，因而使新概念的发明成为必须，而非累赘与重复。

2. 对地理概念的重新估价。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地域作为说明的本原，同时涉及到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到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等。根据人们选择这些集合中的这个集合或那个集合，地域的意义和作用便有所变化，当然不是彻底的变化。”^⑪如前所述，现存的亚洲研究是将地理作为一成不变的地域界线。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深具创新性的研究（如芝加哥大学的“区域研究，地区世界”课题）令人信服地表明：地理可以被视为“进程”，它们经历了“人类组织的各种不同的行为、互动、贸易、旅行、朝圣、战争、殖民化和流放等等地区说被看作论题形成的最初格局，它们造成了不同的地理，而非由预先设定的论题所形成的固定的地理”。阿尔君·阿伯杜莱也指出，区域“并非一个孤立的岛屿”^⑫。从这个角度看，辽阔的南中国海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将中国与东南亚割裂开

来的地理屏障；相反的，它更像一条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通过它，人口与货物不停地流动并形成新的形态。即使横跨中国与大陆东南亚之间的崇山峻岭也没能阻挡富于冒险精神的云南人进入缅甸与泰国，并形成新的文化与种族认同^⑭。

3. 建构跨国领域之间的“接触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文化研究和移民社会学中的某些概念或许有助于我们的分析。根据斯坦福大学玛丽·路易斯·普特拉（Mary Louis Pratt）的观点，“接触区”指的是“殖民遭遇的空间，在这空间里地理与历史上彼此分离的各民族相遇，建立起持续的关系，但经常又有威胁、极端的不平等和无法控制的冲突等情况出现”。接触区同时也是一个交流的区域，哪怕这交流是不平等的。普拉特称之为“跨文化性”（transculturation），在这一过程中，“从属的或边缘的群体在一些由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或世界性的文化输送给他们的材料中进行选择和创造。虽然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无法轻易控制来自支配地位的文化的东西，但他们确实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自己要采纳和吸取什么，并将之作何用途”^⑮。如果我们将“接触区”的理论扩大到非殖民社会、后殖民社会，以及非西方之间，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在 20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接触区”基本上是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虽然中国仍然受到华夏中心这一历史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指的是“移民形成与维系的多重的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进程；我们称之为跨国主义，以强调许多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social fields）；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国移民在原籍地与定居地的多重卷入”。更广义地说，跨国主义是“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⑯。以上两个理论和概念不仅涉及民族国家，而且更注重不同地理／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及其后果，因而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4. 重新界定中国与东南亚。在建立中国—东南亚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过于强调它们的特殊性，将这两个区域“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如果从跨国的角度来审视“接触区”中的共生与歧异，我们就必须至少从四个层面来分析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一种文明^⑦、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宏观经济区域的一个部分（如华南）、或者亚洲区域的政治经济强国。将中国当作一种文明，这有助于探讨各种文明与文化之间的跨界交流与融合；而将华南视为中国的象征，则使我们能够重归史前的模式，在那时“华南是东南亚文化和语言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⑧。而强调中国在亚洲区域的作用，能够将东南亚之外的大国的影响纳入其中。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中国中心论”的偏见和误区，我们尤其要注重中国—东南亚互动之中的反向交通，即在不同历史时期，东南亚是如何影响作为四种形象出现的中国的内部发展的。

5. 挖掘新史料。从跨国和区域内接触区的角度为出发点，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分析新史料，而且可以找出过去被忽略的资料的价值。例如，对外国或其他次区域的旅行见闻录通常没有引起史学家的重视，因为它们难以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然而，一些研究东西方或东方社会之间交往的著作却大量地采用这类资料，并且令人信服地表明，它们不仅有助于了解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对彼此的看法，而且也能解释这些旅行见闻录或文学创作者的自身认同与观念^⑨。至于新史料，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中国驻东南亚使节所写的回忆录^⑩，它们包含了有关两个区域之间互动关系的详细资料。如果能够将它们与同一时代的来自东南亚或其他地区的有关记载相互比较分析（例如新近出版的《基辛格档案》中包含了许多 70 年代中美领导人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的看法^⑪），我们就能够建构起中国—东南亚接触区的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图景。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方法还是资料来讲，中国—东南亚学的建构都是可能的，而且，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如果能将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和理论性的分析框架、用于解构这两个地理文化圈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新力量和国内后果，这或许有助于摆脱西方中心的枷锁，从而建立起“从亚洲看亚洲”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中国—东南亚学”的现实性： 以“接触区”的四类个案为例

如果说建立中国—东南亚学这一分析构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之用于分析 20 世纪的历史事实？本部分将以过去这一百年间中国与东南亚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接触区”的个案为代表来分别论述这一新兴的研究途径的现实性。这四类个案包括：（1）在 20 世纪初期的观念上的双向交流；（2）30 年代所形成的社会机制，用以维系移民进程与东南亚的新华人移民社会；（3）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成为后殖民时期印尼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以及（4）90 年代的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及其对华南的影响。这些事例涉及从东南亚殖民化到非殖民化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它们同时也涵盖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文明、华南以及区域经济大国这四个层面。

（一）近代中国—东南亚互动的建立（1900—1920）

对于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而言，20 世纪的头 20 年间可以说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这期间，亚洲第一次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出现；这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印刷资本主义”和西方的扩张，这种民族主义在整个世界创造了各种类

型的“想象的共同体”^②。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通常都是强调反帝这一主题，并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出发点^③。这就因此忽视了在亚洲国家之间广泛存在的观念上的互动及其对各自内部进程的影响。

在与南洋交往的过程中，20 世纪初的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明”而出现。然而，这已不再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日益深重的西方的侵略之后，中华文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这已经成为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所最为关注的课题。与此同时，随着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瓜分的完毕，除了泰国之外的东南亚各国也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暗淡的前景成为维系这两个不同地理／文化圈的知识分子的纽带。这导致他们在观念上的交流与互相学习，从而形成了“非国家中心”的论说；在其中，亚洲“成为激进的、政治化的、文化的区域概念”^④。

从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的观点来看，东南亚人民已经不再被视为毫无文明可言的“南蛮”或“夷狄”；相反地，他们被塑造成与中国人一样的“同种民族”。例如，在 1899 年至 1903 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将菲律宾人描述成在与“白种人进行的全球性斗争中的黄种人的同样的先驱者”^⑤。同样地，19 世纪末期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泰国朱拉隆功国王的改革十分关注；他们所办的报刊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的报道，并强调中、泰之间的异同之处^⑥。另一方面，在东南亚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中国成为重要的仿效对象。越南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念的了解是通过中国作为中介渠道的；而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则被他们广泛地传阅。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则是越南民族运动之先驱者潘佩珠的学习榜样^⑦。在印尼，早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如苏加诺、哈达、丹马拉卡都深受中国观念的影响^⑧。

中国—东南亚的互动不仅体现在观念上和想象中，它也被

实到具体实践之中。例如，孙中山就积极参与了 1898—1900 年的菲律宾革命；他还二度安排将军火运送给菲律宾革命者，并深信“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完成我们自己的革命进程”^②。这种相互交往与协作成为“泛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正如苏加诺所说的：“自从 1918 年开始，通过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就根植于我心中”。他还认为，印尼与中国都是“东方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团结的精神和兄弟般的情感”^③。

20 世纪初期，中国—东南亚的互动与互助构成了观念、行动和族群性之间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华侨”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和政治论说的核心概念，形成于 19 世纪末期，这绝非偶然。这期间，各种不同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从满清官方到保皇派到革命派——都试图影响日益增长的东南亚华人社群^④。这不仅导致后者的政治化，而且也为中国—东南亚之间的“接触区”注入了新的种族内涵。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在观念上的传播经常是透过在海外的华侨。大卫·马尔（David Marr）指出，“中国维新派的报刊，通过在越南的华侨社区而迅速广泛地传播。这些著作被不断地传抄、翻印，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在一两年内，整个越南的知识界都受到了最新的中国思想的影响”^⑤。而以马来文出版的、由印尼土生华人所撰或译写的众多书籍中，也有不少是与政治和民族主义思潮有关^⑥。普拉迪亚·阿南达·杜尔的历史小说《足迹》更是以来自中国的第一代华侨洪山梅作为 20 世纪早期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播者。事实上，这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⑦。

（二）重组跨界社会机制（20 世纪 30 年代）

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东南亚之间的接触区逐渐出现了制度化的因素与力量；作为人口与货物交换的一个重要机制，华人

社团开始占据了日益显著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到 20 年代时，已经导致了在东南亚各地华人聚居地的形成与迅速发展，华人社团也因此获得新的重要意义。与 1900 年之前社团主要关注于华人社会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内部事务（如福利、教育等）有所不同，这时的社团成为跨国与跨次区域交往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化桥梁。由于它们代表了地缘、业缘、血缘和方言的利益，社团从垂直联系的角度来讲，能够沟通国家内部华人社群同殖民政府之间的纽带；从横向网络的意义上看，它们又能够有效地联接东南亚华人之间及其同侨乡（华南）的关系。所以，到 30 年代时，华人的地缘、业缘和方言群社团建构了复杂而广泛的机制，在华南地区扮演着“政治活动者、社会救济者、商业信用保护者和传统文化推动者”的多重角色^⑤。这也进而推动并加强了东南亚华人社群之间的团结和“散居者意识”，（Diaspora Consciousness）。

在本时期与东南亚的交往中，“华南”成为中国的代表者。这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的华侨来自这一地区，而侨乡所凸显的是地缘、血缘、方言和家族的纽带的综合体。一直到了 30 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海外华人这种以华南为核心关怀的状况才逐渐改变；保家、卫国成为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华人社团不仅影响了侨乡的发展，它们同时也是“接触区”和“跨文化性”的产物。例如，在南洋的客属团体形成了与在中国大陆所不同的权力联系格局。由于客家人的认同最主要是方言群认同而非地缘认同，他们能够较早地跨越华南侨乡的心态，建构起一种以中国为对象的跨地缘认同。这也成为客家人对当地及中国政治参与特别积极的一项原因^⑥。

（三）现代性的不同模式：中国在苏加诺的印尼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兴起，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模式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第一次以民族国家的完整形象出现于它同后殖民地时期东南亚的互动进程中；而这一民族国家又是同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因此，一直到 70 年代为止，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对东南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样，接触区的共生与歧异也随之更加明显和日益政治化。在二战后的四十年间，中国在东南亚作为双面形象而出现。多数东南亚国家将之视为一种威胁^⑤，这种观念虽然并非建立在现实之上，但它却为各有关国家在内政上实施专制政策和对当地华人采取强制同化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然而，中国还有第二个、也是通常被忽视的形象，这就是作为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仿效对象。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型事例^⑥。

有关战后印尼历史的研究通常都集中在为什么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会失败这一问题，学者们大都从政党体系内部或议会制度之外（如军人集团）来寻求答案。很少有人考虑到在 50 年代的印尼是否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选择模式（在当时，现代性被定义为“采取并获得与工业化国家同样的体制和经济繁荣”^⑦）。

事实上，50 年代中期印尼在西方式民主制度试验上的失败导致许多政治与文化知识分子从非西方社会中寻求灵感。而中国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对象；在这里，中国的吸引力并非由于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它在 50 年代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效和社会稳定，使之被视为“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处方”。而中国与东南亚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的相似之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影响力。印尼知识分子从 20 世纪初期的观念互动历史中获得新的启示，苏加诺就曾将自己比作“孙逸仙的学生”；他还认为，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被印尼人塑造成一个民族主义、而非共产

主义国家。这种将中国“非共化”的潜意识为印尼（一个非共产党国家）模仿中国的某些建国方法铺平了道路。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上半叶，为数众多的印尼人到中国访问，其中多数人带着美好的印象回国，并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书籍。这由此形成了有关中国的三个主体论说：中国作为一个有目标与和谐的社会；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和获得民众支持的民粹主义政体；中国正经历着文化与知识的复兴运动。这样，中国成为亚洲国家建设的一个成功榜样；它被进而“内化”，成为影响印尼内政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在 1956 年 10 月底发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演说”中，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苏加诺告诉他正在经历政治与经济混乱的人民：“我认为，印尼要的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民主。我想为印尼建立的民主是一种有引导的民主，一种领导下的民主。这是一种引导下的民主，有引导，但仍然是民主，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像我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的人民那样从事建设的话。”

这种有领导的民主在本质上与苏加诺所羡慕与观察到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十分类似，而前者也于 1959 年在印尼正式确立。与此同时，印尼也从中国引进社会变革的机制与模式，如 50 年代末期所实施的“新生活运动”，强调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及权贵与民众打成一片。在文化领域的激进主义也被打上中国烙印。例如，普拉穆迪亚对中国文化原则以及知识分子作用的理解成为他自身思想观念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也随之从一个超然于政治之外、强调普遍人道主义的作家演变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信奉者，并成为 60 年代初期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

苏加诺、普拉穆迪亚及其类似观念的政治和文化知识分子构成了 60 年代中期印尼政治两极化的一方。他们成为由右翼军人、地主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等力量所构成的联盟的最主要的对抗势力。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这两种势力的日益白热化的冲